

## 中國的「睡」與「醒」：

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二）<sup>\*</sup>

###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魯道夫 G.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sup>\*\*</sup>

鍾欣志譯<sup>\*\*\*</sup>

至此，我們已經追溯了一則隱喻的傳播及其圖像形式的再現，這則隱喻涉及相互之間不對等的作用力與政權。我們看到漫畫如何用來促使人們應對逐步形成的危機。然而，這樣的研究路徑依舊以民族國

---

<sup>\*</sup>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於2011年的《跨文化研究》電子學刊，*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1): 4-139. 網址：<http://archiv.ub.uni-heidelberg.de/ojs/index.php/transcultural/issue/view/1077>. 今經作者本人同意授權本刊，譯為中文，分三期連載刊登。本文為第二部分譯文，第一部分請參見《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3-44。

<sup>\*\*</sup> 作者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國研究教授暨「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菁英研究群協同主持人。

<sup>\*\*\*</sup> 譯者係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班畢業，曾赴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訪學。

家為分析的預設模式，並無新意。此路徑源自十九世紀對「國族」迷戀式的關注，並持續影響著人文學科的分工。諸如「日耳曼」、「中國」、「克羅埃西亞」的歷史、文學、藝術或音樂等範疇皆據此而生，並有增無減且不證自明地假設，真有某種事物或文化變遷過程，可依照時下流行的，所謂語言、圖像的「想像共同體」，為印刷媒介所凝聚。

目前為止，我們的敘述將故事裡隨處可見的跨文化流動擱置一旁。現在我將重新檢視這項議題，並將跨文化流動視為正常、重要的預設模式。不過，這樣的研究路徑不能只是單純的信念，而應藉由紮實分析豐富的材料，以展現自己的可行性和學術成果。

以「睡」或「醒」隱喻國族、國家、社會、政府或階級，是借用身體這個複雜的有機結構，將這些同樣運作複雜的大型有機結構概念化並加以討論的部分表現。在此概念化的過程中，身體物理性和暫時性的面向，例如疾病，常用來討論其他「身體」的病痛與療法。在歐亞地區，身體的隱喻至少可追溯至紀元前五或第六世紀。<sup>59</sup> 歐洲文藝復興以降，歐、亞或非洲大陸常在文字或圖像的再現中被喻為其他事物。<sup>60</sup> 不過，就算這些圖像描繪的對象十分廣泛，包括三十年戰爭（1618-1648）背景下「歐洲之強暴」，<sup>61</sup> 乃至對不同大陸間文化階層關

---

<sup>59</sup> Dietmar Peil, "Der Staatskörper," chap. C in *Untersuchungen zur Staats- und Herrschaftsmetaphorik in literarischen Zeugniss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Wilhelm Fink, 1983); Gerhard Dohrn-van Rossum, "Politischer Körper, Organismus, Organisation. Zur Geschichte natürlicher Metaphorik und Begrifflichkeit in der politischen Sprache" (Ph.D. diss., Bielefeld University, 1977).

<sup>60</sup> 例如 Jan van Kessel, *Allegories of the Continents, 1664-1666*. 參見 <http://cgfa.acropolisinc.com/k/k-2.htm#kessel>，以及 <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k/kessel/index.html>，或 Giovanni Tiepolo 在維茲堡（Würzburg）皇宮樓梯間所描繪的大陸。

<sup>61</sup> Peter Paul Rubens, "The Rape of Europe," ca. 1630, accessed March 31, 2011, <http://www.peterpaulrubens.org/The-Rape-of-Europa-c.-1630.html>. 此處的解讀或有疑慮，因為這張畫是魯本斯（Rubens, 1577-1640）對提香（Titian, c.1488-1576）一幅同主題作品的巧妙臨摹。提香原作的時間是 1559 至 1562 年，現存波士頓 Gardner Museum，魯本斯曾在西班牙菲利普

係的看法，<sup>62</sup>它們都未能陳述這些對象某一時期的心智狀態。換句話說，上述集合體的心智狀態——不論是睡是醒——並未固定成爲這項隱喻系統的描述對象。

另一方面，在語言使用上，國族沉睡這則隱喻，至少可追溯至文藝復興早期的拉丁文和義大利文詩人佩托拉克（Petrarch, 1340-1374）的作品。他在一首詩裡呼求古羅馬的精神，以喚醒「不知禍患臨頭的義大利。他老邁闌珊，是否無人將其喚醒，只能永遠沉睡？」<sup>63</sup>很有意思地，當時義大利尚未立國，不過是個地理名詞，我們在此見到一個沉睡中的集合體，對自身與外患渾然不覺，卻有位詩人「淚眼」呼喊著古羅馬的「精神」，「將其猛力撼動」（*scuoter forte*）。幾乎所有用來隱喻中國沉睡的元素，都已完備於此。雖然這個例子並未特別指稱任何外國強權，當時義大利境內相互競爭的多股外來勢力早已載明史冊。不過，詩人的注意力卻是指責義大利的內憂，而非外敵的入侵。言下之意是，正因爲「國家」沉睡，才會招來如此外患。於是，內政

---

二世的收藏中見過此畫。

<sup>62</sup> 見 Joachim von Sandrart 的 *Newe Archontologia Cosmica*, 1638。關於各大陸的圖像學，參見 Sabine Poeschel, “Studien zur Ikonographie der Erdteile in der Kunst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Ph.D. diss., Muenster, 1985).

<sup>63</sup> Francesco Petrarca, *Rerum Vulgarum Fragmenta*. Edited by Rosanna Bettarini (Torino: Einaudi, 2005), 1:53. “Italia che suoi guai non par che senta./ Vecchia otiosa et lenta/dormirà sempre, et non chia fi la svegli.” 感謝 Dietmar Peil 教授提醒我查看 *Metzler Lexikon literarischer Symbole*, eds. Günter Butzer and Joachim Jacob (Stuttgart: Metzler, 2008), 322-324。關於「睡」的極有幫助的條目。佩托拉克曾在義大利統一時期被鄙視爲舊秩序的忠實成員，這或許是馬志尼（Mazzini, 1805-1872）、加里波底（Garibaldi, 1807-1882）、魯費尼（Giovanni Ruffini, 1807-1881）等人未曾注意過這條頗具「愛國情操」詩句的原因。見 Amadeo Quondam, “A proposito di identità nazionale, di Petrarca e di Dante” in his *Petrarca, l’italiano dimenticato* (Milano: Rizzoli, 2004), 35-92。感謝波昂的 Geyer 教授幫助我尋得這項關於十九世紀接受佩托拉克的研究。此外，義大利統一時期的 1848 至 1849 年出版的諷刺期刊不斷以「沉睡」一詞描繪義大利，見 Ilaria Torelli with Antonello Negri, “Die Jahre 1848-1849 in den italienischen Satirezeitschriften—ein Überblick,” in *Politik Porträt, Physiologie. Facetten der europäischen Karikatur im Vor- und Nachmärz*, eds. Hubertus Fischer and Florian Vaßen (Bielefeld: Aisthesis, 2010), 279.

成爲批評的對象，喚醒「國家」成爲呼籲的主軸。

十八世紀晚期，國族和階級才成爲固定的範疇，被賦予某種心智狀態與歷史作用力。<sup>64</sup> 這項變化似乎與北美和法國的革命變局有關，包括兩地當時所出現足以左右大局的重要輿論，以及隨圖文印刷傳播而增長的時事參與人數。佳例之一，是1778年英國雜誌上一張有關「國家現狀」，且涉及英國在美洲戰事與國際時局的圖畫（圖七）。<sup>65</sup> 該圖批判了首相諾思（North）的「安撫議案」（Conciliatory Propositions），並附有圖解。圖中不僅將英國畫成睡獅，還把身在費城的豪氏兄弟（Howe brothers）置於遠處，這兩位英國將領的部隊有如烏合之眾。



圖七：〈對1778年2月國勢的看法〉，蝕刻畫，法文說明。

<sup>64</sup> 用睡／醒隱喻基督宗教的信仰意識，牽涉到其他的價值，但也指涉了集體性的事件。所謂「睡」，在此連結著罪性的黑夜，而「醒」——例如1730年代至1750年代發生在日耳曼、荷蘭、不列顛群島和北美的第一次「大覺醒」，或是1800年以來同一清教徒地區發生的第二次「大覺醒」——指的是集體性的信仰復興。這些「醒」含有對理性主義者的啓蒙訴求及其道德神學（theology of virtue）的批判。相關背景參見 Rudolf G. Wagner, *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10-18. 在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佛教脈絡中，睡／醒的隱喻涉及個體的心智狀態。

<sup>65</sup> 關於這張圖的背景見 M. Dorothy George, *English Political Caricature to 1792: A Study of Opinion and Propaga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152-153.

以美洲原住民為代表的美國正在割取英國商業的牛角，也就是這隻「可憐的溫馴母牛」的自衛武器——此點呼應著遠景中毫無用處的英國海陸軍。荷蘭人正在擠牛奶，西班牙人和法國人不費吹灰之力地各自取得一碗牛乳。英國這頭獅子沉睡不醒，對眼前國防和國力受到的劫掠絲毫不以為意，就連（荷蘭）哈巴狗都可以隨意在牠身上小便。此人不在圖畫中，也不跟其他角色有任何互動；他其實是圖畫本身，正對著畫面外的觀賞者呼喊，提醒他們從睡獅身上看見自己。只有英國輿論如醒獅般奮起，畫面上的情況才有可能改善。如此隱喻式的圖像語言進一步建構了自己的語法：當「母牛」的「天然」防衛被繳械後，「獅子」可以成為牠的救星。

位於這幅漫畫中央的角色是代表英國商業的乳牛，牠象徵著富有商業價值的各樣貨品正靜靜地被剝削。這樣一種表示國家毫不反抗被剝削的形象有其長遠歷史。<sup>66</sup> 此處母牛被牠周圍不同國家的代表予取予

<sup>66</sup> 1587 年的版畫〈低地國的母牛〉（Die Khue auß Nider Landt），是這類將母牛置中，其他角色環繞四周的早期例子之一。人口眾多（Volckreich）的低地國的肥乳牛（feiste Khue）除了肥，天性溫和，不好戰，是四位武裝人士竭力（grosse muhe）獲取的目標，他們的身分刻在畫上，分別是西班牙、法蘭西、日耳曼和蘇格蘭的代表，正分別取用著母牛的牛乳或其他部分。



注釋圖一：〈低地國的母牛〉，1587 年。

用毫無抵抗、隨人取奶的母牛代表國家的圖像，同樣四處傳播。下面是某

求，我們可以看到已然發展完備的圖像及語言策略，為的是向大眾灌輸罪惡感，激發他們的愛國心，並形塑國家意志。母牛四周的國家僅僅得利於英國自身的軟弱，而非將各自的意圖強加其上，可知，周邊國家並非這張畫抗議的對象。後文將顯示，這是整個十九世紀廣泛使用的一種圖像模式，有過多種變體，<sup>67</sup> 它也是〈時局圖〉構成的基礎。

睡／醒的隱喻一方面廣泛用來描述國家，一方面也用來描述其他集合體。例如，1789 年一幅法國漫畫就試圖喚醒中下階層，並呈現覺醒後可能獲得的益處（圖八）。

份埃及諷刺期刊上代表埃及的母牛：



Le Français dit à Riaz "La vache est maigre, toi et l'Anglais ne lui avez plus laissé de lait."

注釋圖二：法國人對 Riaz 說：「牛太瘦了，你跟英國人一滴奶都沒留下。」

取自 *Le Flutiste* (= *Le Journal d'Abou Naddara*), 1880.

<sup>67</sup> 早期另一幅使用同樣模式的例子，是 1780 年印刷的“Argus”。畫中喬治三世睡著在王座上，皇室官員準備拿走他的王冠（送給年輕的王位競爭者 Charles Edward Stuart）。畫面右邊，英國獅正在熟睡。不列顛女神坐在一旁，姿勢看起來或是絕望，或是同樣沉睡，不過從她的盾牌閒置在側看來，應該是睡著了。此圖翻印於 Tamara Hunt, *Defining John Bull: Political Caric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Georgian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2003), 127.



圖八：〈第三階級的覺醒〉(Reveil du Tiers État)，蝕刻畫，手工著色，1789年。下方文字：「天哪！我該醒來了，鐐銬的重量讓我噩夢連連。」(Ma feinte, il étoit tens que je me réveillisse, car l'opression de mes fers me donnions le cochemar un peu trop fort.) 遠處是經過動亂後的巴士底監獄，以及人群揮舞著砍下的人頭。貴族和教士深感震驚。

歐洲其他國家同情法國大革命反封建訴求的人士，紀錄了覺醒的法國人和他們昏睡的同胞之間的不對等。法國發生的事件，同時被描述為追求自由理想與國家主動防衛的起床號。瑞士的例子或可闡明這樣的情況（圖九）。<sup>68</sup>

<sup>68</sup> 法國大革命作為其他國家從昏睡中「覺醒」的角色，麥肯齊（Robert Mackenzie）在《泰西新史攬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1880）書中特別強調。他在頁62表示，正是拿破崙「將義大利從幾世紀的沉睡中（sleep of centuries）喚醒，使其終於得以經歷自由一統的國族生活。」此書在清末曾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譯入中國，此句作「迨聞拿破崙以民主為主，凡事力求便民，間日恍然醒悟，翻然改變，適與百年



圖九：Laurent Midart：〈瑞士人的覺醒〉。

法文說明：「勝利之後，瑞士人過於安逸，便睡著了。此時他的武器退化，體力也衰退。公雞叫聲喚醒他，太陽使他頭腦清晰，自由女神為他帶來新武器，讓他可以對全宇宙展現，他並未失去先祖的美善和勇氣。獻給瑞士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總督，Soleure 公民 Laurent Midart 作。」

前所行相反，今日日臻隆盛。」參見《泰西新史攬要》（上海：廣學會，1898年），卷2，頁29a。其中，“sleep”一詞並未譯出。我在海德堡的同事 Thomas Maissen 把這張瑞士的圖畫介紹給我，十分感謝。相關討論見其“Der Freiheitshut. Ikonographische Annäherungen an das republikanische Freiheitsverständnis in der frühneuzeitlichen Eidgenossenschaft,” in *Kollektive Freiheitsvorstellungen im frühneuzeitlichen Europa (1400 bis 1850)*, Jena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8, eds. Georg Schmidt, Martin van Gelderen and Christopher Snigula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06), 133-145.



法國大革命的理念與拿破崙在歐洲與北非的擴張主義結合後產生的國族主義論證，較為關注國族的而非階級的心智狀態。吉爾瑞（James Gillray, 1757-1815）反法與反親法英國人士的漫畫是很好的例子，這些人在畫中努力讓不列顛女神保持沉睡，不想叫醒她（圖十）。



圖十：James Gillray：〈育嬰——不列顛女神沉睡「和平」中〉，1802年。

國內同情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使英國入睡，愛丁頓（Addington）首相是帶頭的裸母，Lord Hawkesbury 和 Charles James Fox 是他的左右手。「和平」指的是與拿破崙簽訂的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吉爾瑞認為條約內容喪權辱國。

保衛國家利益的盾牌和武器閒置在床，<sup>69</sup> 不列顛女神的巨嬰形象

<sup>69</sup> 對於不熟悉這幅漫畫中所有人事物的外國人，德語期刊 *London und Paris* 10 (1802): 331-343 裡，可以找到鉅細靡遺的解說。此處的插圖亦翻印自這

栩栩如生，手邊的武器，需要三位裸母防範她有所動作。這三位裸母不只用法國派、壁爐框架上的麻醉藥和溫柔的搖籃曲哄她入睡，搖籃上的拉丁文題字“*requiescat in pace*”通常用在墓碑上，暗示著裸母們希望不列顛女神永遠醒不過來。<sup>70</sup>如前所言，女神本身才是問題，而非外國勢力。她既然睡了，英國政客想方設法讓她繼續睡下去。

拿破崙失敗後，維也納會議開始徹底打壓自由派的言論，但歐洲不同民族國家間的衝突更加惡化。一幅1842至1843年數月間——即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Frederic Wilhelm IV）短暫廢止「圖禁」（*Bilderverbot*）之時——在日耳曼印刷的圖畫便以此為題，這幅精心之作在當時極受歡迎（圖十一）。

「米歇爾」長久以來便是日耳曼的象徵，此時陷入沉睡。1843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為這幅漫畫作了極為詳盡的注解。注解的方式，是讓一位站在柏林漫畫店門口的路人了解各種人物的意涵，於是對柏林人發表意見。<sup>71</sup>米歇爾的沉睡，給了外國勢力——由此時的標準圖像代表——可乘之機。他的嘴巴被卡斯巴特決議（*Karlsbad Decrees*）鎖住，這項決議在三十八個日耳曼邦國中實施嚴格的出版審查；米歇爾衣服上的碎方格即表示這些邦國。奧地利總理梅特涅握有開鎖的鑰匙，他是卡斯巴特決議的推手，正忙著放米歇爾的血，而他放出來的血都變成金幣。<sup>72</sup>約翰牛（*John Bull*）即畫面中的牛頭犬，<sup>\*1</sup>牠從米

---

份期刊。

<sup>70</sup> 吉爾瑞是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反「共和」聲浪的激烈政策的死忠份子，他曾在另一幅作品“*Political Dreaming: Visions of Peace! Perspective Horrors*”（1802）採用過同樣主題。

<sup>71</sup> *Der Deutsche Michel: erläutert von einem seiner Freunde und Leidensgenossen* (Leipzig: Renger'sche Buchhandlung, 1843).

<sup>72</sup> 雖然注解十分詳盡，但小冊子根據這個角色身上的鑰匙，認為他是 *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卻欠缺說服力（頁18）。*Von Ense* 原本是份浪漫主義文藝期刊的編輯，之後分別在奧地利、俄羅斯和普魯士擔任軍事與外交職務。

<sup>1\*</sup> 譯注：“*John Bull*”是「英國佬」的代稱，中文習慣譯為「約翰牛」，但此處“*Bull*”的原意便是牛頭犬（*bulldog*），與牛無關。“*John Bull*”更為正確



圖十一：R. Sabatky：〈德國佬米歇爾〉（Der deutsche Michel），白堊石印畫，1843年。

歇爾的口袋裡叼走錢包，代表日耳曼邦國對英國的貿易赤字。法國軍人正割下米歇爾的外套衣袖，代表要求割讓萊茵河東南的領土。左邊是米歇爾的惡夢，教皇高坐在永恆的雲端，拿著他的大鑰匙；小冊子把他描述為歐洲的守夜員。背景畫的是日耳曼邦國的部隊，姿態一絲不苟，軍官卻對米歇爾的處境視若無睹。

米歇爾並非政府，但鄰近國家對其土地、貨物的控制和剝削，皆始於他與生俱來的睡意。這些國家並未使他入睡，但努力確保他醒不過來。1843年《柏林報》（*Berlinische Zeitung*）上的一篇文章對這幅漫畫如此表示：圍繞在「唯一完全被動的角色四周，是群姿態鮮活的

的譯法應是「牛頭犬約翰」，此處暫且依照中文慣用的譯法。

主動分子，他們唯一的目標便是確保這個可憐的角色保持被動。」<sup>73</sup>也就是說，米歇爾的睡意與列強努力阻止他甦醒這兩方面的意思，觀者看來一目瞭然。<sup>74</sup>

這幅漫畫遠不只是描述性的，它讓觀賞者發現自己的愛國心沉睡得無影無蹤，難以保護迅速崛起的日耳曼國族，成了取笑和羞辱的對象。這張圖的目的，是促使米歇爾醒來。同一時間前後，薩巴奇（Sabatky）還用漫畫創造了科幻式的情境（圖三十一，見下期），畫裡的米歇爾不但醒了過來，手裡還拿著棍棒，胸前的普魯士鷹取代了方格狀的日耳曼邦國。他起而對抗列強，代表後者的圖像符號可在另一幅畫作中看到。<sup>75</sup>在柯尼斯堡（Koenigsberg）開石印畫坊的藝術家溫克勒（W. Winckler）也用科幻風格呼應此一主題，畫出甦醒的米歇爾（圖十二）。這些漫畫全都強調，繪製米歇爾沉睡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剖析或陳述行爲，而是爲了刺激日耳曼同胞，呼籲民眾奮起投入國族事業中，抵抗睡著的米歇爾與列強之間作用力的不平等。<sup>7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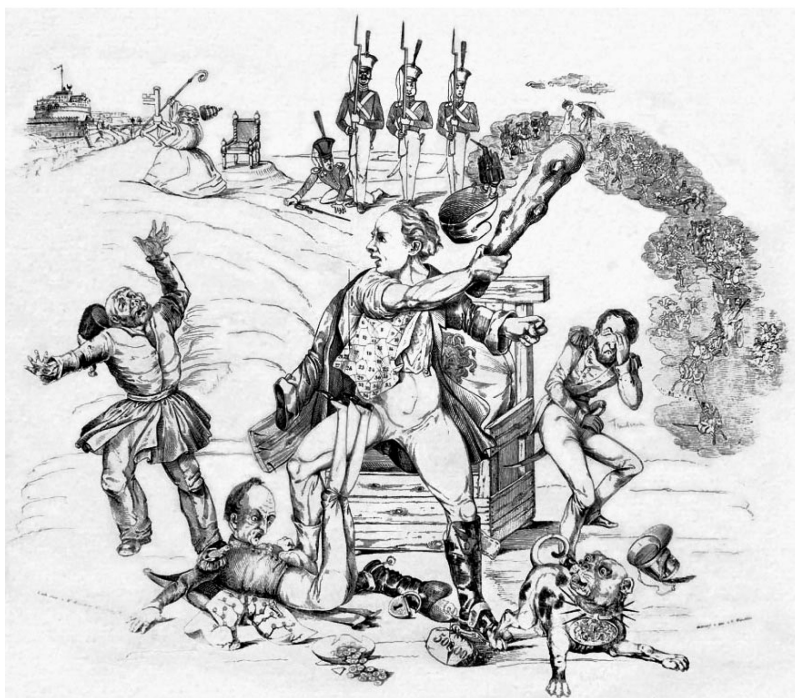
---

<sup>73</sup> “Abermals eine Berliner Carrikatur,” reprinted from *Berlinische Zeitung in Politische Karikaturen des Vormärz (1815-1848)*, ed., Remigius Brückmann (Karlsruhe: Badischer Kunstverein, 1984), 85.

<sup>74</sup> 當時，米歇爾睡著的主題在不同印刷品中反覆出現。1842年，顯然見過吉爾瑞作品的克勞斯（Anton Klauz）把米歇爾畫成被綁在搖籃裡的巨嬰，嘴巴被糖巴塞住，糖包上面寫著「政治自覺」（politisches Selbstbewusstsein），以梅特涅爲首的列強圍在他身邊唱著搖籃曲。圖文交替的描述：「睡吧，米歇爾，睡吧，你一直都是（圖示）綿羊，再睡一下，你還不認識（圖示）貓頭鷹」——德文的「貓頭鷹」（Eule）與「著急」（Eile）諧音，意思是「你一點都不急」。複印本參見 *Politische Karikaturen*, ed. Brückmann, 83.

<sup>75</sup> R. Sabatky, 無題，白堊石印畫（Berlin: Julius Springer, 1843），複印本參見 Brückmann, *Politische Karikaturen*, 86.

<sup>76</sup> 科隆市立博物館，RM 1928/91。複印本參見 Brückmann, *Politische Karikaturen*, 88.



圖十二：W. Winckler：〈無題（甦醒的米歇爾）〉，石印畫，1843年。

雖然相互參照薩巴奇作品裡的圖像配置，便能解釋溫克勒畫中大部分的暗語，但後者仍舊增加了一項新元素。米歇爾一語雙關的睡帽（這個字的德語“Schlafmütze”也是懶惰蟲的意思）已經掉落，他先前的夢境也隨之展現：教堂隊伍、滿載戰爭飾物的馬車、普魯士國王和王后、被法國人俘虜的「父親萊茵河」、（尚未完工的）科隆大教堂正用雙腿行走等等。此處，沉睡不只表示感官意識和行動的缺席，還充滿各種「落後的」夢，並且這些夢皆非旁人造成，而是米歇爾自己所做。雖然漫畫點明「傳統」夢境使米歇爾落於人後，卻未指出他之所以醒來的原因。其實沒有原因，只有希望。關於此點，後文另有討論。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國族」在外患臨門時陷入沉睡——不論出於自身的因循怠惰或有外力介入——且可能與內部分子如滿州人、英

國雅各賓黨或日耳曼軍隊狼狽為奸的想法，已經是文字與圖像創作的套語。日耳曼作家如 August von Platen、蓋柏 (Emanuel Geibel) 或海涅 (Heinrich Heine) 都不斷提到日耳曼人「睡著了」，並且對自己的國族危機不以為意。<sup>77</sup> 例如，海涅在1844年的詩作〈教條〉(Doktrin) 第二段寫道：

隆隆鼓聲播醒人民，  
隆隆號角青春奮興。  
踏步隆隆邁向前方，  
學識之道捨此難行。<sup>78</sup>

鼓聲、鐘聲等等都是睡／醒之喻的自然延伸物，後文將接續討論東亞地區的例子。日耳曼共和人士甚至幻想過利用皇帝費德烈一世的傳奇爭取權力：他和一批全副武裝的軍隊（包括戰馬）已在深山沉睡了好幾世紀，等著覺醒、衝鋒、壯大日耳曼的時機。<sup>79</sup>

一開始在歐洲脈絡裡，睡／醒之別便有時間上的落差。當法國公雞開始啼叫，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開始升起，瑞士人以及更晚的日耳曼人才正要醒來。在現代化的大敘事 (master narrative) 中，這樣的時間差在亞洲國家身上更因為文化與地理上的距離有增無減，後者無法如英、

<sup>77</sup> Heinrich Heine, *Sämtliche Schriften*, ed. Klaus Briegleb (Munich: Hanser, 1974), 5:210. 有關「睡」的討論不同於有關「夢」的討論，後者具有來自佛教思想的脈絡。相關討論參見 Bernard Dieterle and Manfred Engel eds., *International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vol. 7, *The Dream and the Enlightenment. Le Rêve et les Lumiè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3) 以及 Peter André Alt, *Der Schlaf der Vernunft. Literatur und Traum in der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Munich: Beck, 2002).

<sup>78</sup> Heinrich Heine, "Doktrin," *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 48 (July 20, 1844): 1.

<sup>79</sup> 見 Emanuel Geibel, "Barbarossas Erwachen," in *Geibels Werke*, ed. Wolfgang Stammer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18), 1: 183-186. 海涅曾對這些費德烈復甦的幻想加以戲謔，見其 *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 eds. Ursula Roth and Heidemarie Vahl (Stuttgart: Metzler, 1995), 98-120, sections XIV to XVII.

法等國逐漸目睹各項發展過程，往往必須面對突如其來的發展結果，其歷時經年的過程遠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外。如此的雙重距離，加上資訊匱乏、不明就裡，使他們睡得更深，需要更大力量方能喚醒。

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開始使用由睡到醒的隱喻，以建構不同國族在雙重距離影響下，從傳統到現代急速轉變的大敘事，而這些國族在他們選擇封閉自鎖的政策中，更加擴大了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距離。在歐洲充滿爭議的亂象中逐步發展出的「現代性」，經過多元轉化，一股腦地全部來到亞洲，後者若要拒絕這套產品，勢必賠上自己的主權與尊嚴。一則1897年的日本論調曾為中國改良派雜誌《時務報》轉譯：

〔日本〕當文化文政之時，雖邊疆聞警，而懶夢未覺。及嘉永四年，美國水師提督伯兒利來浦賀埠，長睡始破，而外交之端，蓋始乎此。當是之時，人民愛國之心，勃然興起，勤王攘彝之論，遍於海內，而數百年所積習封建之制廢矣。<sup>80</sup>

此文並未反對外國入侵，甚至接受日本的「覺醒」是拜裴利上將（Admiral Perry）的黑船駛入東京灣所賜，然後描述覺醒後的日本如何堅持以西化的改良自立自強。不過，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在於，中國對西方的侵襲仍舊缺乏類似反應。

麥肯齊（Robert Mackenzie）在《泰西新史攬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1880）書中用非常類似的隱喻描寫印度，此書的中文譯本（1898）曾被中國引為現代化之鑑。在其中詳細討論基督教傳教士對印度英語教育的發展，尤其是對婦女地位的影響一章，麥肯齊結論說：

印人既通英文，凡英之道德、學問、法程，隨噍通於全境。新學校既如林立，尚復有加無已。印度雖為古國，當未立新學之

<sup>80</sup> 貞吉譯：〈記東邦學會事〉，《時務報》第17冊，1897年1月13日。

先，數千年如在夢中，今則如夢方覺矣。<sup>81</sup>

甘地也在1909年用過這項隱喻，並將分治（partition）視為喚醒沉迷的衝擊。他甚至提到了印度的心智狀態。在回答「〔印度〕何時／如何方能真正覺醒」此一問題時，甘地表示：「〔對於1905年的孟加拉分治，以及由此而生的許多動亂與國會黨的成立〕我們得要感謝柯榮總督（Lord Curzon）。」被問到「所以您認為分治是覺醒的原因嗎？您是否樂於接受分治帶來的動亂？」時，甘地回答：

人剛睡醒的時候會轉動身軀，難以靜止，但不會馬上醒來。同樣地，雖然分治帶來覺醒，睡意仍未消失。我們仍在轉動身軀，難以靜止，而就像我們無法避免半睡半醒的狀態，此時印度的動亂也可視為一種無法避免、且合乎規律的狀態……睡醒時，睡意終將退去，我們遲早將完全恢復知覺。<sup>82</sup>

睡醒的故事最終成為大敘事的一環，甚至在東亞重要地區被拿來描述英國。1897年10月《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上的文章〈眼下中國教育〉並未談論英國當時進行的公務或教育制度改良，反

<sup>81</sup> 麥肯齊：《泰西新史攬要》（上海：廣學會，1898年），卷10，頁12a。

<sup>82</sup> M. K. Gandhi, *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 原刊於《印度輿論》（*Indian Opinion*, 1909年12月11、18日）上的古吉拉特文（Gujarati）專欄，甘地英譯。網址：<http://www.mkgandhi.org/swarajya/coverpage.htm>，檢索日期：2011年3月31日。因為這段文字是對《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09年9月18日，頁387）上G. K. Chesterton每週專欄Our Notebook的反應，它被認為是項跨文化交流。見Martin B. Green, *Gandhi: Voice of a New Age Revolution* (New York: Axios, 2009), 266; Ramachandra Guha, "A Prophet Announces Himself. Mahatma Gandhi's 'Hind Swaraj' a Hundred Years 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4, 2009), 14-15. 甘地曾將Chesterton這篇文章的大部分譯成古吉拉特文，於1910年1月8日發表在他的《印度輿論》上，日後又被譯回成英文，收於*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Ahmedabad: The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63), 9: 425-427，並被題為〈白人對印度覺醒的看法〉（White's Views on Indian Awakening）。



而談到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相關段落在《時務報》上的譯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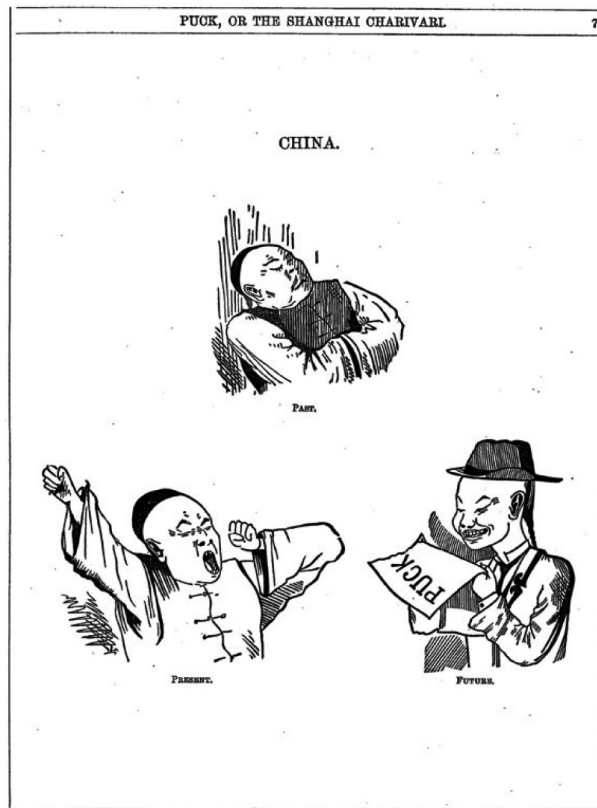
中國之於今日，猶英國之於維新之初。（紀元一千五百年後）  
黑暗之世，英國固亦曾親歷也。英人於酣睡之中，豁然而醒，  
見教養之事，實在祭司，而祭司亦必取資於拉丁希臘文，於是  
發奮為學，廣設學院。然當日英人雖能為學，亦猶是中國今日  
之士子耳。<sup>83</sup>

這篇文章表示，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比中國更重視教育。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將以類似英國文藝復興的方式，把繼承的古老知識傳遞下去，這固然是種覺醒，卻已不合時宜。文章認為，應該用白話中文教育「大眾」，用英文教育「菁英」。

1870年代，以沉睡（或更為不堪的）隱喻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意象，已經開始出現在文化交會的環境中（contact zone environments）。以中國來說，我們可在1872年上海第一份外文的諷刺畫報《上海幽默畫報》（*Puck, or the Shanghai Charivari*）中見到（圖十三）。

---

<sup>83</sup> 孫超、王史譯：〈中國教養〉，《時務報》第45冊，1897年11月15日。此段譯自“The Immediate Future of Chinese Education,” *North-China Herald*, October 29, 1897, 776-777，原文如下：“Educationally the present position is not unlike that of England at the period of the Renaissance. In common with other lands, England had passed the Dark Ages in a state of intellectual torpor. She woke to find that not only all knowledge was in the hands of priests, but that even for them the search for it had to be through the secret syllables of unspoken tongues. To gain knowledge of these hidden mysteries became the aim of every thinking man of means. The grammar schools of Edward VI were the result, and the English “scholar” soon became what the Chinese “scholar” is today, literally a reading man and no more.”



圖十三：《上海幽默畫報》，1872年2月1日。

從上方按逆時鐘方向，依序表示「過去」、「現在」和「未來」。

「過去」的中國如其服裝所示，陷入沉睡，泥於傳統。「現在」的中國正要醒來，而「未來」的中國，將藉由閱讀《上海幽默畫報》擴展視野，理解外國漫畫與文本，同時身著「摩登」洋裝，戴洋帽，打領帶。

這隱喻也出現在埃及。1881年，一位僑居巴黎的埃及人出版的法文與阿拉伯文雙語諷刺刊物 *Abou Naddara* 上面便可見到（圖十四）。



圖十四：最初的埃及人民……懲罰……埃及的精神自長久沉睡中醒來，驅逐邪惡的官員，杜霏克及其黨羽落荒而逃，1881年。

「埃及的精神」由右側的人民會堂代表表示，這是根據英國所支持的改革所成立的機構。杜霏克總督（Tewfik Pasha, 1852-1892）的政權出亡（就任者是之前受到排擠的 Hakim Pasha）。Abou Naddara（قراظنوباً）偶爾加上副標題「埃及青年的喉舌」（Organe de la Jeunesse d’Egypte），是份阿拉伯文和法文雙語諷刺刊物，由 James Sanua（Şannū’, Ya’qūb ibnRāfā’īl, 1839-1912）在巴黎出版。<sup>84</sup> 這幅漫畫反映了我們一開始討論的中國情境裡同樣的過程：從文化中介（cultural broker）的雙語能力、漫畫形式的引入、跨越國境的出版地點，直到境內公民和流亡分子的讀者。

早在 1850 年代，土耳其的國際認知便促成了此種隱喻的使用。

<sup>84</sup> 複印本 *Abū Nazzarah* (Beirut: Dār Šādir, 1974).

該國 1890 年代末期的解體，成爲中國改良人士憂心國運的前車之鑑。1898 年百日維新時，康有爲寫道，英國「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字，無有留者」之時，土耳其卻「恃其強大，酣睡於其比鄰」。<sup>85</sup> 1920 年，中國首屈一指的言論刊物《東方雜誌》翻印了一張西方漫畫，題爲〈土耳其之今日〉，把沉睡的隱喻擴展至疾病和年老體衰（圖十五）。

### 日 今 之 其 耳 土



### 國 夫 病 之 息 一 奄 奄

圖十五：圖中老人疑爲 Jacques Rawson。

<sup>85</sup> 康有爲：〈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康有爲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頁299。

列強的國別可由制服上的圖案加以辨識，他們或者示好，或者強取。《東方雜誌》翻印此畫，是爲了對中國過度依賴外債提出警告。

#### 四、沉睡的巨人

如同上述各項例證所顯明的，以沉睡隱喻大帝國（鄂圖曼帝國、中國）的描述與日俱增，並逐漸進入國際外交、法律和權力政治的知識領域。不過，政論家對沉睡之喻的其中一種變化形式感到特別貼切，即「沉睡的巨人」。在十八世紀英語出版品中，便時常見到以此比喻某種尚待開發、暫時休止，而令人不安的強大潛能。相關例證有愛爾蘭政府（1797）、<sup>86</sup> 英國艦隊（1876）<sup>87</sup> 與美國德州（1881），<sup>88</sup> 但也包括「良知」（1850）<sup>89</sup> 或愛爾蘭醫生的待遇（1857）。<sup>90</sup>

沉睡巨人的隱喻之所以家喻戶曉，或許要歸功於綏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這本小說在十八與十九世紀受過教育的階級中，擁有廣大讀者群（圖十六）。

---

<sup>86</sup> “Letters from the Mountains. Letter VII,” *The Press* 3 (1797).

<sup>87</sup> Editorial,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 (Dublin, Ireland), November 24, 1876.

<sup>88</sup> “Letters to the Editors,” *Liverpool Mercury* (Liverpool, England), August 30, 1881; Issue 10495.

<sup>89</sup> “Varieties,” *The Derby Mercury* (Derby, England), May 1, 1850; Issue 7046.

<sup>90</sup> “The Dispensary Doctors,”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 (Dublin, Ireland), August 26, 1857.



圖十六：身處小人國的格理弗，1727年。

遇上船難的格理弗在昏睡中被小人國的國民網縛，但因為雙方遵從文明禮儀，他成為小人國的盟友，以巨人之力助其退敵。格理弗恰當地象徵了歐洲小國與鄂圖曼或中國如此龐大的帝國之間可能的關係，這方面的引用十分常見。<sup>91</sup> 同時，格理弗的昏睡，暗示著大帝國

<sup>91</sup>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土耳其成為「文明」國家的成員，開始受

的制度、風俗或工業尚未甦醒。

中國和鄂圖曼帝國日後共享了（一在東亞，一在波斯普魯斯海峽）「病夫」，乃至「腐朽」、「垂死」的身體隱喻。這些隱喻採用另一種形象來描述和討論他們與西方國家之間作用力不對等的情況。同時，鄂圖曼帝國和中國的領土，都被比做甜瓜或蛋糕，任憑列強據為己有，或納為殖民地。<sup>92</sup>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是「垂死」的「病夫」，或者「沉睡的巨人」，成為西文書寫中十分常見的說法。

總結來說，民族國家的概念框架、國族沉睡的隱喻，以及相伴而生的圖像，均始自歐洲文藝復興早期，自十八世紀末葉後廣泛用來描繪歐洲國家的國族特質，進而成為眾所皆知的隱喻符號，代表現代性的缺乏，與未能激勵人民增進國族利益的無能。從西方語彙觀之，土耳其和中國都符合這些特質。

以沉睡的巨人形容中國（下文將提舉出文獻實例），是對中、西作用力不對等的明喻，因為它是西方在日益相連的世界語境中，早已成形的比喻。在未來無法預知的情況下——巨人有一天將會醒來——它標誌著西方（與日本？）對現實秩序還能維繫多久的焦慮。他們可能喪失目前享有的優勢，因為甦醒過來的會是張牙舞爪的巨人，而非膽怯的小老鼠。附帶一提，許多描述中國 1990 年代以來經濟起飛的比喻偶而帶有歇斯底里的言語，顯示出類似的焦慮。

由此可見，本文一開始切入的中文討論，其實與西方的討論有所

---

到「國際法」的規範。1856年4月6日有位都柏林的牧師在一篇關於和平的講道中如此表示：「土耳其曾被稱為『垂死的病夫』，叫它沉睡的巨人或許更恰當。我們無法再忍受他作法自斃，這個國家若不復興，只有毀滅。」“The Peace,” in *The Belfast News-Letter* (Belfast, Ireland), April 14, 1856; Issue 123819.

<sup>92</sup> 我正在研究這方面特殊修辭的跨文化旅程與變體。據說，拿破崙 1816 年在聖海倫娜島上與亞美士德公爵（Lord Amherst）交談時，率先形容中國是「沉睡的巨人」。見 William Safire, *Safire's New Political Dictionary: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New Language of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715. 不過，我尚未看到十九世紀的文獻提及此事，也找不到亞美士德公爵的對話紀錄。

互動，後者並從具有中國經驗之人所生產的大量西文著述獲取訊息，如外交官、傳教士、軍人、博物學家和商人等。

從地點上來說，具有雙語能力的中國讀者，也可在國內取得這些有關中國的西文著述，例如上海和香港的西文報紙，與其他中譯文本。在此，我們已可清楚看見前文統計沉睡之喻使用次數的圖表有何方法上的缺陷：它的操作前提是一個中文的公共領域，此領域範圍等同清政府領土，再加上少數移居日本之人。

若要研究「中國沉睡」的隱喻在中文語境的發展和使用，我們必須重新定義相關討論的運作框架。與中國相關的非中文書籍、文章、報刊，以及它們的中譯本，不論出版於境內或海外，加上涉及這項隱喻的不論何種語言的素材，都必須涵蓋進來。<sup>93</sup>

## 五、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

如前所言，第一位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參與西方有關中國沉睡之辯的中國人，是派駐倫敦、巴黎和聖彼德堡的大使曾紀澤（Tseng Chit-se, Marquis Tseng）。他發表於1887年的文章〈中國先睡後醒論〉用英文撰寫，以便參與並回應相關問題的討論；這篇文章的出版，標誌著日後中國內部論爭的重要轉折。<sup>94</sup>

當時，中國沉睡的比喻已是西方世界評估整體對華關係的速寫方式，包括對中國政體現況的定義，並直接涉及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國面對明顯不對等局勢可能採取的對策。列強的外交政策從英國主張的「門戶開放」與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到更具掠奪性的劃分

---

<sup>93</sup> 可惜我們無法以統計曲線具體表達這些多元研究的成果。基於「民族國家預設模式」建立資料庫所導致的缺憾之一，便是排除了豐富的多語材料，無法完整呈現生活中的跨文化及跨語際連結。前文統計所用的資料庫，只收錄了中文的，而完全沒有出版於中國的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材料。

<sup>94</sup> Tseng Chi-tse,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no.1 (1887): 1-12.





國這隻烤豬，他們各自的身分可由字母縮寫辨認。構圖的方式，明顯可見其他圖像的影響。日本不在列強之列，文字說明也強調這是外國人做的夢。此處的中國早已了無生氣，不只是沉睡而已，而是肥美多汁、滿足列強胃口之物。

曾紀澤對此認知的英文回應，成為中國覺醒——曾紀澤宣稱已然開始——的一項徵兆。他的文章沒有中文稿，這位極為難得能夠掌握流利英文的中國官員先向秘書 Halliday Macartney 授以綱要，再由秘書「與老闆一同」<sup>95</sup> 起草。

曾紀澤的文章直接迎戰西方國家的討論，後者的代表，是威妥瑪 (Thomas Wade) 這位了解中國語言、文化與制度最為透徹的西方人，也是日後英國駐中國大使所寫的一篇文章。1849 年，威妥瑪綜述閱讀了一年中國官報《京報》後的心得，寫成〈1849 年大清國國勢及政府〉一文。他以非常近似當時描述鄂圖曼帝國的用語寫道：

即便看來毫無入侵、動亂、造反的可能，我斗膽認為，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雖然一片祥和，卻正緩緩衰落。<sup>96</sup>

這段話到了 1887 年，變得頗為諷刺。威妥瑪預測「毫無侵略、動亂、造反的可能」時，正是一連串極大規模的造反活動（南方的太平天國、北方的捻亂、西南的回亂）正要發生之時，距離英法聯軍入侵中國北方也只有十年。曾紀澤也許不無諷刺之意地讚美「英國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國之時事及古今之典籍，一時未能或之先者」，<sup>97</sup> 因為他冷

---

<sup>95</sup> Demetrius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08), 431.

<sup>96</sup> Tseng, "China," 2. Thomas Wade, *Note on the Condi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1849* (Hong Kong: 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50), 83.

<sup>97</sup> 曾劫剛（曾紀澤）原著，嚴詠經〔譯注：即嚴永京〕口譯，袁竹一筆述：〈中國先睡後醒論〉，《申報》第 1 版，1887 年 6 月 14 日。這句話原文為 "a writer whos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its literature is perhaps unequalled, and certainly not surpassed....."

冷地結論道：「觀近時大勢，其謬益見。」然而曾紀澤也承認中國一度沉睡，只是反對「衰落」和「滅亡」的說法：

如謂中國有似年老者，慳慳待盡，則觀近時大勢，其謬益見。有謂中國或僅錯走其路，抑或其數百年所走之路，習慣而素所深喜者，竟誤認為固可引致諸大國所造之勝境，致有此凋敝之形。

我們看到米歇爾的睡帽所代表的內涵，在此轉化為中國的「數百年所走之路」。曾紀澤認為，中國已經被那些威妥瑪表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喚醒：

尚須庚申圓明園之火焦及眉毛，俄國之僭伊犁，法國之吞東京，始知歐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勢極形危險。蓋自庚申一炬，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已獨沉迷酣睡，無異於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央咫尺平靜。

曾紀澤對中國局勢的巧妙描繪，預示了本文所論多幅漫畫的構圖；他接著主張，「喚醒中國」與維護中國主權的辦法，必須以建設海防和海軍為主，而非政治、教育改良或工業發展。<sup>98</sup> 這項意見與前文所引《法越交兵記》中，清國官員在西人入侵時猶在夢裡，而後「夢醒，又預備」海防「二十餘年」的記述極為接近。回溯原始素材，可知這段話出自〈此時西人論粵防云〉；如前所言，該文由曾根嘯雲和王韜翻譯並收入他們編輯的書中。<sup>99</sup> 曾紀澤熟知這本1886年出版的書，因為他曾以駐倫敦和巴黎大使的身分，與法國人直接交涉停戰事宜，且是該書多次引述的對象。於是，他1887年發表的文章默認了外國人對中國國防在清廷官員努力下已有進步的評價，這些官員過去「沉睡」，而依曾紀澤所言，如今已然覺醒。1884年，中國甚至拒絕了法

---

<sup>98</sup> 曾紀澤過世的父親，以及此文寫成時主導中國外交政策的李鴻章，均是洋務運動的關鍵人士，他們自1860年代起便推行改良，以圖自強。

<sup>99</sup> 這段話出自第436頁，第9行。

國對安南中法戰爭的賠償要求，曾紀澤把這些顯著的進展歸功於自強運動人士（如他自己與他父親）。不只如此，曾紀澤令人訝異地——安南不過兩年前才割讓給法國——宣稱，中國雖然「幅員遼闊」，如今也有保衛自己權力的意願與能力。其中，朝鮮首先被提及。

不過曾紀澤接著安撫對於「沉睡巨人」行動的焦慮。他說，要是巨人醒來的話：

以上所言，是言中國之睡，今姑言其醒。有問：「中國三萬萬人，如一時俱醒，而自負其力，其作事得無碍於中西之和局否？」或「記昔時之屢敗，今驟得大力，得無侵伐他國否？」余應之曰：「決無其事！」蓋中國從古至今，祇為自守之國，向無侵伐外國之意。<sup>100</sup>

曾紀澤的文章以英語寫就，是份獨一無二並深富謀略的「國家文件」（state paper，《紐約時報》用語），也是國際媒體的焦點。<sup>101</sup> 作者直接涉入中國在國際上的評價和引發的憂慮，並被普遍認為是難以望其項背的李鴻章的接班人選。他的文章閱讀者眾，在報上和外交圈內被多次引用；<sup>102</sup> 原本刊登此文的該期《亞洲評論季刊》尚未寄達，便已轉

<sup>100</sup> 曾劭剛（曾紀澤）原著，嚴詠經口譯，袁竹一筆述：〈中國先睡後醒論〉，《申報》第1版，1887年6月14日。

<sup>101</sup> 《北華捷報》在1887年3月2日記道：「這篇文章……據說出自曾侯部之筆，不難想見它持續引發大量的關注。」該報推斷這篇文章是北京朝廷授意的官方政策。

<sup>102</sup> 曾紀澤對此頗為欣喜。他在寫給秘書，同時也是文章起草人 Halliday Macartney 的信中提到，德文和俄文譯本正在進行。見 Demetrius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08), 431-437. 英國方面的反應參見 Sir Rutherford Alcock 與 W. Lockhart 對曾紀澤文章的評論 “Chin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in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443-466 and in *The Spectator*. 美國的反應參見 Chiu Ling-Yeong, “Debate on National Salvation: Ho Kai versus Tseng Chi-ts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 (1971): 38-40. 另可參見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5章第3節。有位審查人指出，法國外交部的檔案藏有〈時局圖〉

載於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上海《字林西報》和《北華捷報》與天津《中國時報》(*Chinese Times*)報章——佔據版面之廣，可見編輯布爾傑宣傳有術。簡而言之，這篇文章廣為身在中國與關心中國事務的西方人所熟知。<sup>103</sup>

中國社會裡極少數但地位顯要的人，包括多位與洋人往來與雇用洋秘書翻閱報紙、處理信件的高官，以及愈來愈多能閱讀英文的商人、官員和學者，都在1887年6月中上海《申報》刊登第一個中文譯本前，就已知道曾紀澤的文章。<sup>104</sup>有趣的是，《申報》這份最為重要也最受重視的中文報紙的所有人，卻是一群英格蘭與蘇格蘭人，並由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9)經營：就連曾紀澤文章的中文翻譯，都來自一位外國人的安排，刊印在一份外國人所有的報紙上。

西方世界對這篇文章的反應還算友善，但常具批判性。據說，俄國外交部長 Alexander Guchkov 對曾紀澤斷言中國的覺醒感到十分震驚，甚至接受了曾紀澤歸還中國領土的要求。<sup>105</sup>不過，英國的中國專家如阿禮國爵士(Sir Rutherford Alcock)覺得，曾紀澤言過其實，中國

---

複本，其他複本也很可能收藏在列強諸國的相關檔案中。我尚未追查這項重要的建議，其中很可能找到外交人員對這幅漫畫的意見。或許我會在進一步研究後，加上一份「附錄」。

<sup>103</sup> 英文報紙的轉載可見(香港)《德臣西報》，1887年2月2日；上海的《北華捷報》，1887年2月16日，頁181-182；(天津)《中國時報》，以及《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第18卷第4期，1887年4月。1887年2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文中與美國相關論點的長篇摘要，以及對作者和文章本身的頌詞，認為「幾乎便是作者政府未來目標與政策的宣言。」《亞洲評論季刊》在亞裔社群閱讀者眾，也常被英國報刊評論。

<sup>104</sup> 曾劫剛(曾紀澤)：〈中國先睡後醒論〉，《申報》第1版，1887年6月14-15日。

<sup>105</sup> 1905年日本的一篇文章表示，曾紀澤的文章「實風靡於歐洲外交社會。俄外部大臣古察科夫至因此震驚，納曾惠敏公伊犁條約之要求。」見〈論中國外交本原〉，《外交報》第5卷第30期，1905年12月11日，譯報第一類，頁12。這篇文字譯自〈清国外交の活歴史〉，《東京日日新聞》，1905年11月5日，頁6的第四部分，原文顛倒了時間順序——中俄在聖彼得堡改訂伊犁條約是1881年的事情。

「覺醒」的可見徵兆不過微乎其微；他認為，在缺少政治與制度改良的情況下優先鞏固海防，是高估了技術層面的力量。<sup>106</sup>「就算是睡著好了」，阿禮國寫道：「必然睡得十分深沉，更像是催眠實驗導致的徹底沉眠，而非任何正常情況下保有意識與活動力的狀態。」但他承認，中法戰爭時，中國發現了自己在資源上未曾預料的強項——面積：

我確信，中國人在被迫面對東京事件引發的衝突時學到不少。特別是意識到他們得力於廣大的國土面積，足以承受懲罰的能力只有少數國家堪與匹敵。這對他們來說，是在缺乏抵禦外敵的積極手段時，某種消極的反抗力量。法國人在幾乎未遇中國人主動抵抗的情況下，製造了難以計數的傷亡、大量的財產和貿易損失，並且摧毀了其中一座耗時多年、開銷龐大方才興建完成的造船廠。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民，以及對北京政府來說，這些都未能引起重視，也未能使法國的事業有所進展。最後，這些戰果也無法迫使中國政府接受法國一開始堅決要求的條款。兩三年積極侵略下來，法國人比中國人受到的損耗更大。因此，勝利最終屬於中國人，而不是他們的敵人。<sup>107</sup>

在華西文報刊的評論者較不留情。對於曾紀澤描述中國「彷彿返老還童、改頭換面的強大國家」，《北華捷報》形容那「只是換新包裝以迎合時代的吹牛老套。差別之處在於，英文報紙採納了曾侯部的無知來理解中國的現狀，且慎重其事地根據他的臆測評估中國的未來。」《北華捷報》贊同法國總理費利（Jules F. Ferry, 1832-1893）

<sup>106</sup> Sir Rutherford Alcock, "Chin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443-460. 這是一份對曾紀澤文章的詳細評論。一篇批判性的摘要可見 *North-China Herald*, May 27, 1887, 569. 類似的評論出現在倫敦的《觀察者》(The Spectator)，引用於《亞洲評論季刊》第3期，見 Chiu, "Debate on National Salvation," 37. W. Lockart 在他的文章〈中國及其外交關係〉(Chin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裡，針對勞工移民、治外法權與海軍統帥等議題質疑曾紀澤。

<sup>107</sup> Alcock, "Chin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449.

所言，中國不僅沉睡未醒，更已瀕臨死亡，根本微不足道（quantité négligeable）。<sup>108</sup>

將這些文字定調成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反應並不合理，因為中國改良人士也提出過極為類似的批評。一旦把它當作中國內部關於國族現狀與未來的討論來閱讀，問題便不只在於曾紀澤的判斷是否正確，而在於，是否選擇洋務派——即加強海防，且忽視、壓抑進而改變政體結構的提議——非但將對國家無益，還會造成一定損害。

對曾紀澤文章最為詳盡且最重要的批評，是香港《德臣西報》轉載此文數天後，何啟（1859-1914）以 Sinesis 為筆名在同一份報紙上發表的言論。<sup>109</sup> 何啟是在香港接受英語教育的基督徒，他曾留學亞伯丁（Aberdeen）修習法律和醫學，娶英國女子為妻，以英語撰文。他在香港地位顯赫，曾創辦醫院，並以剛過世妻子之名命名這間醫院（孫中山便在此處接受醫學教育），也曾共同創辦以英語教育中國學子的香港大學。同時，他也間接跟其他說、寫英語，參加地下「革命」活動的中國人有所接觸，這些人欲使廣東省獨立，以便加速當地的改良步伐。<sup>110</sup> 何啟在香港的英文報紙發表大量文章，談論他所認為中國需要的改良方案。<sup>111</sup> 他跟《德臣西報》和《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等英文報紙的英國自由派編輯往來密切，文章在這些報上刊登，並為其社論所支持。他的多篇文章被朋友譯為中文，編輯成書，並成為 1901 年清廷開始推行「新政」時，相關討論的重要

<sup>108</sup> *North-China Herald*, March 2, 1887.

<sup>109</sup> Sinensis (He Qi),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a Mail*," prefaced by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Zeng Jize's article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The China Mail*, Feb. 16, 1887, 2.

<sup>110</sup> Gerald H. Choa,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Ho Kai: A Pro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關於何啟，另參見 Woo Sing Lim, *The Prominent Chinese in Hongkong* (Wanchai: Five Continents Book, 1937)；林啟彥：〈嚴復與何啟——兩位留英學生近代思想模式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1-21。

<sup>111</sup> Anon. [He Qi], Editorial, in *The China Mail*, March 12, 1895. 支持他的社論發表在 3 月 18 日的同一份報上。

依據。<sup>112</sup> 何啟後來還被封為爵士。

何啟的英語文章指責曾紀澤基本上錯估了中國的情勢，並認為他對作用力與權力普遍不對等的相應之道有瑕疵。相對於此，何啟提供了他自己革新中國政體的藍圖，把焦點放在公平、公開的政治機構和教育，而非外洋的技術性設備上。他同意中國「沉睡」的看法，並盼其早日甦醒。「我已經期待他〔中國〕從幾世紀的昏沉大夢中醒來很久了。」然而，甦醒無跡可尋：「在我見到中國認真推行內政改良，並將經年羈絆他的禍害——也就是使他變得如今這般弱小和怯懦，並帶來無數羞辱的禍害斬草除根之前，我不會相信他已真正覺醒，即使他在海防與海、陸軍上有所加強。」中國政體得以運作的基礎是：

公平的規則與正義的政府。中國永遠難以成為眾多支持者所天真寄望的樣子，除非他先行放棄不法對待自己的子民，學習不偏不倚地伸張公義——包括反對各樣貪官污吏，並且以公正、開放的政策保障人民的和諧與福祉。<sup>113</sup>

何啟所提出的想法，顯示了他對西式概念和標準的經驗及信念。

對何啟或謝纘泰這樣的人來說，香港與其他口岸城市提供了跨語言、跨文化資訊與意見——包括公共輿論——交流的絕佳環境。這些地方可以取得主要的西方報刊、書籍；當地的英語刊物和多數改良派的中文刊物，也都盡力提供讀者最新的國際言論及訊息，每週出版詳細摘要，介紹重要報刊的社論內容、中文刊物上的言論，與《京報》上的備忘錄。這些都是口岸城市報刊的固定內容。有些刊物如《新聞紙》（*London and China Express*）幾乎以整份的篇幅，匯集形形色色

---

<sup>112</sup> 何啟：《新政真詮》（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1898, 1900〕）。據謝纘泰所言，何啟撰寫過一份改革計劃，內容包括推翻滿洲王朝。這份計畫曾以代社論的形式發表在1895年3月12日的《德臣西報》。

<sup>113</sup> Sinensis (He Qi),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a Mail*," *The China Mail*, Feb. 16, 1887, 2.



西方材料裡關於中國，以及中、英兩國間互動的言論和訊息。<sup>114</sup>

1884年，何啟結束了他對中法戰爭處置失當的批評，以及對軍隊整編的建議。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他的建議今天聽來都極為政治不正確：「討論至此，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常勝軍』在如今慘亡的戈登將軍（General C. G. Gordon）的傑出率領下，曾經有過的成就。」中國軍隊可能要靠外國將領才能發揮最大效能的看法，英國陸軍參謀長沃斯立（Viscount Wolseley）兩年前就建議過，但像何啟這樣的人重彈此調，突顯出這些改良派菁英對中國群眾沉迷夢中的現況，有多感到氣急敗壞。<sup>115</sup>

雖然我們沒有曾紀澤的回應，但他很明顯非常注意自己文章所引起的效應，包括閱讀香港、上海和天津出版的英語報紙。<sup>116</sup>於是，我們得以一窺文化交會地區裡，清朝高官和新興公共知識分子之間溝通論辯的過程。

這些有關中國時局的論辯並未局限在單一框架內，「中國沉睡」此一隱喻的意涵，從瀕臨死亡的中國，到沉睡不起、有待內部政體重整的中國，再到曾紀澤樂觀斷言已經全然甦醒、足與列強抗衡的中

---

<sup>114</sup> 1898年1月到2月初出版的三期《北華捷報》上面，摘要並節錄了來自超過18個國家地區、83種報刊（英國27種，美國9種，中國8種，日本7種，德國6種，香港5種，俄國4種，法國3種，新加坡3種，韓國2種，錫蘭2種，丹麥、西班牙、泰國、緬甸、越南、加拿大和南非各1種）的內容。其中屬於「中國」的8種都在通商口岸出版。當時英國刊物普遍都會提供最近報刊的內容，這甚至是部分刊物僅有的內容，如 *Review of Reviews*。

<sup>115</sup> 參見注128。當時這樣的想法頗為稀鬆平常，因為一開始清政府便曾委託一位英國海軍軍官重建中國海軍。

<sup>116</sup> 此點披露在曾紀澤的醫生德貞（Dr. Dudgeon）寄給天津《中國時報》的信件裡。他抱怨該報某篇報導有失公允地指控曾紀澤對一些不比「殘渣敗類」好多少的外國人屈意奉承。德貞表示，「曾侯部大人明智地決定不理會報上文章」，他寫信給《中國時報》，是為了抗議這則「張狂」、「粗糙」與「有損名譽」的指控。他說，這些指控毫無根據。這封信部分刊登在《德臣西報》，1899年9月9日，頁3；該報也曾轉載《中國時報》上的這條新聞。

國。下文將論及，沉睡的隱喻難以完全表達某些人的想法，於是他們發展出附屬的隱喻概念，如死亡、衰弱和老化。當何啟談到「弱小和怯懦」時，這項發展已經開始了。

「中國沉睡」的討論，在1887年以英文逐步發展於中國與列強的主要文化交會地區，即香港、上海和天津等地。投身中國政治的政治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如曾紀澤和何啟）出身中國，但精通外文，參與了這個原本以英文進行的討論。他們是將此討論帶入中文圈的文化仲介，並根據他們關注中國的角度提出見解。接著，雖然這項討論原本僅限於能夠閱讀英語文章的人之間，新式媒體卻將它轉化為國際性的公開事件。在此情況下，「中國沉睡」之喻的散布和挪用，便順理成章地出現在中文世界裡。

跨文化流動的過程絕不是模糊的抽象理論；我們可在這個例子裡具體而微地見到它流動的方向。將「中國沉睡」之喻散布於中文世界的第一步，自然是翻譯。1887年5月，曾紀澤文章的中譯本出現在上海《申報》上，不久又有另一份譯本出自隸屬總理衙門的京師同文館，該館時由丁韞良（W. A. P. Martin）主持。<sup>117</sup> 何啟的評論文章，也在1887年5月由《德臣西報》的中文版譯成中文。<sup>118</sup> 前文以純中文資料庫所製成的圖表，顯示1887年前，使用「中國沉睡」之喻的例子只有一次，也就是出現在曾根嘯雲和王韜在香港所編印的書中。當我們把香港、上海和天津出版的外文刊物，以及牽涉或關注中國的出版品如布爾傑的《亞洲評論季刊》或《教務雜誌》都納入考量，便可糾正這樣的印象，並顯示出我們所面對的，其實是一項跨語言和跨文化討論的傳布過程。任何將其從屬於族裔、國家或語言內的簡易、

---

<sup>117</sup>《申報》1887年6月14至15日刊登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由嚴詠經口譯，袁竹一筆述。總理衙門的譯本後來也收入《皇朝蓄艾文編》（上海：官書局，1903年），卷1。

<sup>118</sup> 佚名（何啟）著，胡禮垣譯：〈書曾襲侯中國先睡後醒論後〉，《華字日報》，1887年5月11日。這項出處參考 Chiu Ling-Yeong, “Debate on National Salvation”，我不清楚這段時間的《華字日報》是否存留至今。

時髦之見，都無法在資料上獲得佐證。

曾紀澤文章的譯本、何啟的評論，以及1887年6月《申報》上的一篇社論，引發了中文圈的討論。<sup>119</sup>當時中國剛剛開始參與這項戰略性的公共論辯，雖曾迅速消聲沉寂了一段時間，但在1894至1895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的衝擊後重新出現，這場戰爭戳破了曾紀澤對中國海防與新式海軍所下的斷言。1895年後重啟的討論，延續了外文刊物裡對曾紀澤先前斷言的指涉。圖表裡1896和1897年的中文有關資料，大部分均來自西文和日文文章的中譯。

換句話說，中文刊物上的討論與國際上的討論持續保持密切互動，而不僅是單一語言內的對話。此點與我們觀察到的種種概念和實行方式的跨語際流動相吻合。在我自己對「運動」作為社會行動方式的研究中，不同運動在各地方產生的種種行動彼此複製形式和內容，從未停止互通聲息，並有意識地與現在或過去擁有高度公眾與（或）國際聲望的「運動」建立關係，以加強自身的合法性。<sup>120</sup>

不過，1895年後有關「中國沉睡」的外文文章翻譯，已經暗示了一項轉變。這些文章由中國改良派人士開辦的新式刊物選譯出版，使其納入以中文進行的論辯裡。下文將可看見，負責挑選文章的，跟自己寫作時愈來愈常使用沉睡隱喻來描述中國的，其實是同一批人。

1884年受中法戰爭刺激，對中國終能覺醒的期待再度浮上檯面。但在1895年甲午一戰的打擊下，頗為廣泛的見解是，中國不只必須改造整體政治結構，倘若缺少外來壓力，此點實難達成。以本文探討的隱喻來說，中國不會自己醒來——他需要強大的外在壓力。這項看法首先表述在1897年的英語刊物上，並藉由梁啟超《時務報》

<sup>119</sup> 〈書中國先睡後醒論後〉，《申報》，1887年6月19日，頁1。那時候的口頭討論難以在此詳述，不過曾紀澤的文章十年後再度被提及，顯示出文章在這批當時十分年輕的中國改良派人士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sup>120</sup> Rudolf G. Wagner, "Canonization," 69-95. 另參見 Rudolf G. Wagn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iscourse and Imagination in China at Tiananmen," in *Rethinking Third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Manor (London: Lonan, 1991), 131.

所譯一段倫敦報刊的對話，被帶入中文圈的討論。對於中國是否只要接受西方嚴苛的意見，並按西法主動改革就能成功，這篇文章直言不諱地答道：

非也。我國若信汝所說備辦，靡不債事矣！中國正在酣睡之際，雖間或反側，必不遽醒。以維新而論，中國若無外人相逼，欲其發憤，振作自新，決無此事。<sup>121</sup>

首屈一指的改良派期刊未加按語便收入此文，表示對其立場的基本接受。

在相似的脈絡中，我們看到「巨人沉睡與甦醒」主題的新變體。前文所引《北華捷報》上關於中國教育的文章，同樣提供了一份中國教會學校的概述，它的結語十分樂觀：如今，在敗給日本後，巨人總算該起床了，但願國內外的債主們不再讓他睡著。「他們〔教會學校〕的努力值得讚揚，但這國家從未起身迎接，也未感謝過他們的努力。但情境已變，睡著的巨人終於醒來，我們可以期待他的債主不會讓他再睡著。」<sup>122</sup>當時中文翻譯則略去了巨人：「惟統中國數百兆人，大都視西法為無足輕重之事，無踴躍奔赴之意。則教士與學會之所為在此，華人之所志不在此。所為雖善，而仍無補也。雖然目今中國變而思變（指中日軍務後言），猶久睡者初醒，蒙深望中國之一醒而不復

---

<sup>121</sup>〈論中國將來情形〉，《時務報》第6冊，1896年6月29日，譯自倫敦《東方報》。李鴻章和慶親王也認為外國的壓迫有其必要。義和團事變與聯軍攻佔京津時，列強組成委員會起草條約，要求中國改組外交部門，將總理衙門提升為外務部。李鴻章向列強提議進行這項改組，同時明確地以口頭要求，倘若接受，應當作列強的要求向清廷提出，而非他的提議。參見 Fabian Münter, “Das Waiwu Bu 外務部—— Reform des chinesischen Außenministeriums 1901-1911”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2009), 27, 引用 1901 年 4 月德國外交部一份有關這項討論的密件備忘錄。在中國的歷史書寫裡，外務部改組一事習慣性地被描寫為帝國主義強加的要求。參見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75。

<sup>122</sup> *North-China Herald*, Oct. 29, 1897, 776-777. 參見注 83。

睡也。」<sup>123</sup>或許當時「沉睡巨人」的說法尚未從英文轉為中文的隱喻用語，譯者才將其略去，以免中國讀者不知所云。

1898年，就在著名的「百日維新」開始前，《國聞報》中譯刊載了一篇同年1月1日倫敦報紙的文章，但我尚未找到這篇文章的原文。<sup>124</sup>《國聞報》的主編嚴復（1853-1921）是英文政治、社會哲學作品的著名中譯者，譯作深具影響力。這篇文章提供了典型的例證，讓我們看到面對不對等的權力與文化交流變動時顯現的矛盾心理；此文譯為中文，由主編嚴復附加按語，加強了這方面的矛盾心理。文章談到聖誕節期的和平信息，與同一時間德國、俄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列強「分割中國」的努力格格不入，然後接著說道：

我英現任陸軍大元帥某君〔沃斯立〕，曾於數年前論中國事，謂：「中國民眾四百兆，假天生拿破崙於其中，奮其才勇，以爲之君，振長策以鞭笞宇內，數年之後，歐洲之人將絕跡於亞東，而太西種族將爲所偏處。」其言如是。

這段文字提到的，是沃斯立1895年關於中國前途的文章，當時中國被日本擊敗的消息剛剛傳出。沃斯立是英法聯軍（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1859-1860）期間的現役軍官，著有相關回憶錄。<sup>125</sup>

沃斯立於1895年升任英國陸軍參謀長後，立場更加堅定，而他在讀者廣泛的期刊上多次撰文，亦倡此說。《國聞報》中譯稿提及1895年的文章，曾發表在美國《國際都會》（*The Cosmopolitan*）<sup>\*2</sup>雜誌上。當中國再度經歷軍事挫敗時，沃斯立重覆著他的基本論斷：儘

---

<sup>123</sup> 〈中國教養〉，頁11。

<sup>124</sup> 這篇文章據說來自一份英國報紙，其中文譯名爲《國運報》。很遺憾地，我在收錄當時英國報紙、雜誌的資料庫裡使用相關辭彙搜尋後，並未找到這份報紙。

<sup>125</sup> Garnet 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an and Robert, 1862).

\*2 譯注：今譯《柯夢波丹》。

管中國此時軟弱，若是出現類似俄羅斯彼得大帝或法國拿破崙一般能夠激勵全國的領導者出現，將展現驚人的戰略實力。

這個堅毅、精明的種族，人數以億計，只要有人具備拿破崙般激勵人心、指揮群雄、統御大局的才幹，就可搖身變為這世界上呼風喚雨過的所有國家裡最優秀和最強大的一個！可是拿破崙並非想要就會出現。<sup>126</sup>

沃斯立認為中國沒有這樣的人物，但知道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人：

此刻我們都知道，對中國來說，哪位英國人的價值足與皇太子的贖款相比，也知道誰若像戈登將軍一樣受到信任的話，將很快地為皇帝另建一支「常勝軍」，及一支一流艦隊。此時中國最需要的，是另一位戈登將軍的幫助。

中國曾經有過這樣一位將領。沃斯立談到的不是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而是幫助清朝戰勝太平天國的戈登提督（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

沃斯立也提到列強國家的焦慮，他們更希望中國解體，而不是改良後對其造成威脅。

我們是否有理由認定，讓未來的中國盡可能地軟弱，不然便是

---

<sup>126</sup> Viscount Wolseley, "China and Japan," *The Cosmopolitan; a Monthly Illustrated Magazine*, February 1895, 417-423. 1904年，沃斯立進一步延伸他的評斷，口氣更為強烈，也更像是預言：「沒有任何國家在人口數量上像中國如此偉大，整個帝國在風俗與生活方式上如此相通。對我而言他們是地球上最不平凡的族裔，我過去到現在始終相信，他們是這世界未來的統治者。他們擁有好軍人和好水手所需的一切特質，缺的只是一位中國的彼得大帝或拿破崙，並且根據我對未來世界的淺見，我早就看好中國人會是哈米吉多頓之戰（Battle of Armageddon，譯注：《聖經》裡的末日戰爭，見〈啟示錄〉第16章第16節）的勇士，而美國人則是他們的對手。」參見 Field-Marshal Viscount Wolseley, *The Story of a Soldier's Life* (Toronto: The Book Supply Company Limited, 1904), 2: 2.

分裂為數個獨立省，對日本與其他國家最有利？中國若是非常強大，無疑將成為亞洲政局的新角，對某些人更會成為攪局者。這些疑慮讓人看見各種可能出現的變數，不只對日本的，也對歐美各國在亞洲的利益造成壓力。

軍職在身的沃斯立眼光十分獨到，他發現英國這個貿易國會是中國自強後的理想夥伴。

我認為我的同胞最能適應目前的危機，因為我相信沒有別的國家會在避免中國分為數省的情況下獲得龐大利益。大家都說有些國家盼望中國四分五裂，即便如此，英國至少不算在內。就算僅僅站在英國的立場，大部分研究過中國問題的英國人都希望看到中國強大。

沃斯立也提到英國所面對的特殊難題，也就是必須擔憂戰敗的敵方分裂，於是無法提出過度的要求。

[1860年]我們遇上一項從未有過的難題，即皇帝政府內部的虛弱，以及他無法維持中國統一。最了解中華帝國情況的專家向我們保證，只要受到嚴重打擊，只要他所謂的軍力遭遇慘敗，革命與無政府狀態必不可免，王朝也很可能將被推翻。於是，當我們佔領北京或是擊垮中國的軍隊後，我們將沒有可以協商的合法政府或被認可的權力機構。

我稍微詳細分析了沃斯立的文章，因為對之後數十年的中文討論來說，這幾段文字不僅直接有所影響，且持續成為引述的對象。<sup>127</sup>《國聞報》上的譯文之所以引用沃斯立，因為它與沃斯立的見解相同，也

---

<sup>127</sup> 沃斯立文章的摘要，可參見英國刊物 *Review of Reviews*, March 1895, 237; 《國聞報》的譯文預設讀者熟悉此論點，同時，上海的英文刊物 *National Review* 直到1912年仍繼續引用此說，見“*What Lord Wolseley Thought*,” *National Review*, Nov. 12, 1912, 411.

跟沃斯立同樣對中國一旦覺醒的後果感到矛盾和憂慮。報上的中文翻譯接著說道：

不料甲午一役，華師敗北，以區區日本，長驅直搗，勢如破竹。若非歐邦奮其沮力，則日本之取支那，在唾手間耳。此時支那情見勢屈，能事已窮，於是致啟戒心，而列國謀有分裂之事。

吾人向呼土耳其為歐洲之病夫，今則以此名目中國。然兩國情形迥不相侔，未可齊觀，謀國者幸留意焉！夫歐人定瓜分土國之策久矣！……彼土耳其，無數百萬待教之民，足以更新為治也，無千萬里未闢之地，足以廣開利源也。……至於中國則不然，有數百兆勤敏之眾，千萬里未墾之壤，若治以西國文明之道，以開其天然自有之利，則將來之事，恐非吾曹所樂聞也。歐人視華民為木偶，以為觀之足以娛目，用之實無所能，然亦謬矣！

夫中國之病，政病也，非民病也。其未能進於文明之化而大有為者，咎在執政者耳。彼只知守舊不變，於一切歐西新法，多方阻撓，以馴至此日艱之境。今者受侮歐人亦應醒悟矣。

然則中國顧樂酣睡，而歐人必攪之使覺也。中國既寤之後，則將為佛蘭金仙之怪物。斯怪者，任其臥則安寢無為，警之覺則大奮爪牙，起為人害。中國數百兆之民勤儉性成，以之任事，無所不宜。倘舉國人民均受西學之益，精製造、善耕種；以最廉之工人，得機器之妙用；開河道、修鐵軌，以通內外。然後假火車、輪舟之利，輸其貨以實歐美之都，價廉而貨美，以與歐產爭衡，勢必華貨暢銷，歐產擁滯。夫如是，則歐洲之工□將無所措其手足，而其禍有非智者所能預料矣！

今者歐人之言，曰「均商權」，曰「通圓法」，爭八點鐘之工



時、要八先令之工價，至於是日，其所以自活幾何？

嗟嗟！中國之病，非土耳其比也。謂其政病則可矣，謂其明智、儉約、安良之民病，則大不可也！諸國欲裂其地以自肥，何亦不思之甚哉！夫以諸權侮中國，猶以僬僥侮龍伯也，不自量力，乘其酣睡而擾之，其取禍宜矣！過斯以往，恐我子孫未及成人，歐洲各國商務已衰耗，黎庶已困窮，而乃痛詈德皇之為禍首晚矣。<sup>\*3</sup>

嗚呼！佛蘭金仙之怪物，一機械之巧耳，知之則不足畏。若夫中國，物博人眾，用西國之法，以困西國之民，其將為歐洲之害，迥非金仙怪物所可比者，是則大可畏也。<sup>128</sup>

「佛蘭金仙之怪物」<sup>\*4</sup> 是十九世紀英語世界慣用的修辭比喻。這位人造巨人第一位脅迫的對象正是他的創造者，後者追蹤自己一手打造的怪物，想要結束他的性命。佛蘭金仙之怪物成為描述自主體系（如有機體）擴張本能衝動（如佛蘭金仙博士把死刑犯的頭給了他的創造物，藉此賦予他謀殺的本能）至極限的隱喻。這樣的「怪物」通常無法察覺自己行為的後果——雖然佛蘭金仙也曾令他的創造物閱讀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以求將文明元素置入他體內。如此複雜、強烈的比喻，被用來分析政治實體、市場，特別是科學的運作——凡此種種皆缺少與生俱來的文明制約。

沃斯立對中國潛力的評斷出版後，引來許多直接批評。1895年

---

<sup>\*3</sup> 譯注：作者將「德皇之為禍首」英譯為「與中國分享技術與知識的德行」。

<sup>128</sup> 王學廉譯：〈如後患何〉，《國聞報》，1898年3月22日，頁1-2。此文出自1898年1月1日英國某份報紙，其中文譯名為《國運報》。我尚未找到原刊。

<sup>\*4</sup> 譯注：「佛蘭金仙之怪物」（Frankenstein's monster）語出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的小說 *Frankenstein*。今天習慣將這本小說名稱譯為《科學怪人》，指的是書中主角 Frankenstein 博士創造的怪物。雖然日後（不論中英文）時常將 Frankenstein 當作怪物的名字，小說原本卻是以博士，而非以怪物為名。下文沿用晚清譯名，所謂「佛蘭金仙之怪物」即「科學怪人」，「諧理」即「雪萊」。

《太陽報》（*The Sun*，巴爾的摩出版）上刊登了《國際都會》文章的摘要，內容以一則預言作結。作者申論，沃斯立所強調的英國在華商業利益，最終可能玩火自焚：

沃斯立大人的文章，清楚揭示了英國對此議題的感受。看來頗能確定，中國無需大聲呼救，便可得到英國人助其建軍的服務。但到最後，這是否會變成一件危險的事，反而造出一隻國家級的佛蘭金仙之怪物，破壞創造者及他人的利益？<sup>129</sup>

在大英帝國，《國聞報》譯文提到的中國與佛蘭金仙之怪物的連繫並不稀奇。1898年9月，倫敦《泰晤士報》有篇文章報導英國科學協會的年會。在一場關於開採中國豐富的礦產必先戮力建設水上運輸，才能減低成本——雖然勞力成本已然很低——的講座之後，現場主席（或許在間接提及同年1月份的文章時）指出：

跟開發中國有關的另一件事是，當我們推動開發該國時，或許也正在打造一位佛蘭金仙〔之怪物〕。中國可能成為世界的重要生產者，我們可能跟中國調換位置，變成由他們來供應我們產品。<sup>130</sup>

沃斯立的〈中國與日本〉一文，以及此處所引述的緊張反應，在在顯示西方自信的優越感與焦慮的無助感交相混雜的情形；就連英國，都感到自己的優勢即將一去不返，換邊傾斜的不對等局勢也無可挽回。這樣的無助感反映在採取的行動上。不論沃斯立還是其他文章作者，皆未主張殖民中國；他們充其量不過對中國取得現代知識的結果提出警訊。沃斯立贊同英國援助中國進行現代化，包括軍事方面。不過，

---

<sup>129</sup> “Lord Wolseley on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Sun* (Baltimore), Feb. 8, 1895, 4.

<sup>130</sup> “British Association,” *The Times*, Sept. 14, 1898, 8, col. 3，主席是 Colonel G. L. Church.

《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上美國的意見認為，英國獲取利益的方式有欠考量，並未顧及對自己和更多人可能造成的後果。嚴復報紙上的譯文，以及《泰晤士報》所引述的評論，既強烈也無助地警告英國可能遭到邊緣化，亦將引發許多內政問題。

在此同時，他們也都非常清楚，英國也可能從中國的沉睡獲得其他利益。德國皇帝表示自己未來將得到「中國皇帝」頭銜的戲言，引發了一大串關於中國將成為「德國的印度」的緊張評論。<sup>131</sup>1894年日本如預期般地戰勝中國，使《紐約時報》——大量參考了沃斯立的想法——預測日本帝國將把中國納為井井有條的行省，進而成為無可匹敵的世界強權，並將佔領整個歐亞大陸，包括歐洲在內。<sup>132</sup>

上述出版品和說法均對交相錯雜的不同動力具有清楚體認，而這些動力來自不對等的權力，以及不對等的文化流動。權力不對等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裡，最令人焦慮的是中國會從夢中醒來，並利用大量不對等輸入的西學概念、制度和方法，大幅提升自己的富強程度。這會讓中國像日本一樣重振旗鼓。「佛蘭金仙之怪物」是最能捕捉西方知識界在這方面的辯證，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行為可能後果的形象。其背後的假設包括：西方會像佛蘭金仙創造怪物一樣，一手打造出現代化的中國；現代化的中國是「有違自然」的特殊產物，因為他的現代化並非源於自身傳統；於是，既然這隻怪物缺乏以文明約束自我的能力，西方便不假思索地將權力的不對等代換成自己強迫中國改變的資格。如此，便忽視了挪用和適應的作用方向在於引力（pull）而非推力（push）——雖然英、美兩國也隱約察覺作用力的本源，因為他

<sup>131</sup>〈德國皇帝開玩笑〉（*The German Emperor's Joke*）是《觀察者》上號稱報導德國皇帝夢境的一篇文章，此文在《北華捷報》上有詳細的摘要和討論，其中說道：「中國自然可能醒來，但德國在膠州灣的基礎十分穩固，……能夠組成一支由歐洲人指揮的馬來人部隊，也隨時能與北京唱反調。」《北華捷報》並引述原文作結：「中國死透了；那些親王都沒有軍隊；可信賴的義勇軍也不存在；人民不習慣於作戰；就連滿州人也抵抗不了日本人。」見 *North-China Herald*, Feb. 7, 1898, 162.

<sup>132</sup>“Looking Forward,” *New York Times*, Dec. 9, 1894.

們並不主張以外力解決，而是等待中國「覺醒」。英國之所以維護中國的完整，並非爲了應付此刻權力不對等的情況——這對英國不是問題——而是爲了風水輪流轉後可能產生的變故未雨綢繆。不用說，這樣的聲音迴盪在今天某些對中國崛起感到緊張的評論裡，震耳欲聾。<sup>133</sup>

嚴復是致力將現代化引入中國，並鼓吹他人參與這項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從他爲自己報上譯文所加的按語，我們得以看見這樣一位中國人閱讀這份文本的視角。他爲讀者介紹了佛蘭金仙之怪物的隱喻出自「諧理」(Shelley)的小說，當時尚無中譯本。<sup>134</sup>他寫道，書中怪物：

機關振觸，則跳躍殺人，莫之敢當，惟縱其酣臥，乃無事。論者以此方中國，蓋亦謂吾內力甚大，歐之人所以能稱雄宇內者，恃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其所稱中國得天之厚，皆實錄無虛詞。得有爲者，席之以興，誠哉！其可畏也。

嚴復也指出，「大元帥」便是沃斯立<sup>\*5</sup>，「其平居論中國之大可用同此，彼蓋得於戈登也。」<sup>135</sup>

嚴復強調，怪物形象的背後，是西方對中國無窮潛力尚未覺醒的

---

<sup>133</sup> 其中甚至包括中國和佛蘭金仙的連結。媒體曾引述2007年美國眾議院一場論辯中，共和黨議員 Dana Rohrabacher 的話，認爲美國提供中國軍事用途的先進技術，其結果便是「製造出如今威脅到我們自己的佛蘭金仙〔之怪物〕。」見“China ‘Frankenstein threat’ to US,” in *Aljazeera News*, May 2, 2007, <http://english.aljazeera.net/news/asia-pacific/2007/05/2008525125941866484.html>. Accessed Jan. 20, 2010. 利用 Google News 搜尋關鍵字“China”和“Frankenstein”，可以找到非常多項二次大戰與冷戰期間的用語。

<sup>134</sup> 嚴復提到，沃斯立認爲中國需要一位「戈登」助其建軍，因爲報上譯文並未包含相關訊息，嚴復必定讀過沃斯立在《國際都會》上的文章。

\*5 譯注：嚴復稱其爲「烏理西子爵」。

<sup>135</sup> 《國聞報》，1898年3月22日，譯自英國《國運報》，1898年1月1日。另參見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頁88-96。

認知。不論對於西方沾沾自喜且頗為自負地表示，有違自然的橫向移植將導致（中國出現）無法自制的暴力舉止，或是批評佛蘭金仙以科學之名進行的實驗將導致難以預料的惡果，嚴復都不感興趣。對他來說，西方現代性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實力，是不必要也不容許爭辯之事。其實，對於用佛蘭金仙的形象代表中國現代性，將其視為出於外人之手且有違自然的怪物，他曾間接提出異議：

可治化之事，往者由亞而歐，由歐而墨；今者由墨而復西行入亞，此所謂凡動必復者也〔牛頓第三運動定律〕。<sup>136</sup>二百年來之天運人事，皆為其通，而不為其塞。汽機電氣既用，地球固彈丸耳。夫……謂五洲上腴如中國者，可深閉固距以守其四千年舊俗，雖至愚者，知其不然矣。<sup>137</sup>

嚴復論道，以歷史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些文化流動大勢是顛撲不破的定律。歐洲文化最早出現「新石器集徵」（Neolithic package）——從家栽、農耕到治理模式——起始於近東地區，隨後才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北美的歐洲移民文化，一開始也以歐洲為基礎，才有後來的發展。此時，現代性的腳步繼續西行，橫渡太平洋來到亞洲的遠東地區。如此說來，每個人都曾身為其他人的佛蘭金仙之怪物，端看我們要回望到多遠以前的歷史而已。佛蘭金仙的故事所以能夠借屍還魂，意有所指，是因為正像怪物攻擊他的創造者，歐洲也回過身來統治了亞洲大半部，美國也終究超越大英帝國和整個歐洲。嚴復以牛頓的第三運動定律看待社會進化的動力，<sup>138</sup>是為表明，成為別人創造出

<sup>136</sup> 原定律為：「任一作用力均有能量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sup>137</sup> 《國聞報》，1898年3月22日，譯自英國《國運報》，1898年1月1日。

<sup>138</sup> 嚴復在他翻譯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序文中，同樣用了「凡動必復」的這句話，目的是為了證明中國古籍——特別是《易經》——早在牛頓和斯賓塞（Spencer）以前就發展出了他們的核心理論。參見嚴復：〈天演論自序〉，《嚴復集》（北京：新華書局，1984年），冊5，頁1319。

來的佛蘭金仙之怪物，正是歷史進展的方式。嚴復表示，終有一日，亞洲也將回過身來超越美國。

就在嚴復的文章登在《國聞報》上一個月後，梁啟超在北京的一場演講進一步演繹了這個故事。他先是抱怨了中國官員的頑固剛愎和機會主義，指「舉國戢戢，坐待剗割」，接著說道：「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國先睡後醒論〉，西人烏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國陸軍統帥）謂中國如佛蘭金仙之怪物，縱之臥則安寢無爲，警之覺則奮牙張爪，蓋皆於吾中國有餘望也。」<sup>139</sup>但梁啟超論道，這些剩下的期望，都來自對中國真正弱點的無知。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結束「百日維新」之後，改良派人士寄望中國命運「先睡後醒」的希望徹底幻滅。1899年，流亡橫濱的梁啟超談到這項主題。

哀時客〔梁啟超此時的筆名〕隱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咄咄爲動物談……丁曰：「吾昔游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sup>140</sup>

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

<sup>139</sup> 梁啟超：〈保國會演說：閏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1日〕第二次集說〉，《知新報》第55期，1898年6月9日；此處「略述開會宗旨，以筆代舌」。梁啟超明顯未曾仔細閱讀《國聞報》上的文章，該文並未表示佛蘭金仙之怪物由沃斯立提出。

<sup>140</sup> 單正平漏引和誤讀了這句話。他遺漏了「睡獅」前的「謂」〔譯注：以及「又謂之」的「之」〕，理解成「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之睡獅，又謂先睡後醒之巨物。」見其《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26。

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

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  
「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sup>141</sup>

中國只不過狀似一頭獅子，他的人民「鏽蝕」甚深，於是完全沒有醒來的希望。即使流亡在外，梁啟超依舊保持擁護清朝的公共姿態，要求皇帝復位，而非推翻皇朝。在他的解讀中，鏽蝕的獅子並非政府，而是人民。

就在同一年之後不久，梁啟超在一篇關於中國面臨瓜分危機的文章裡，再度重提此事。他進一步說道：「曾敏惠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蘭金仙之喻。」<sup>142</sup> 英國人誤判了中國的國力，深怕自己創造出一隻怪物。梁啟超認為這是過度憂慮，他確信正在「瓜分中國」的不是外國列強，而是中國官員自己。<sup>143</sup> 前文提及黃遵憲家中的〈時局圖〉版本裡有隻中國睡獅，正反映出這樣的看法。（待續）

（責任編輯：曾令愉）

---

<sup>141</sup> 哀時客（梁啟超）：〈動物談〉，《清議報》第13期，1899年4月30日。

<sup>142</sup> 梁啟超：〈瓜分危言〉第四章，《清議報》第23冊，1899年8月6日，頁6a。

<sup>143</sup> 梁啟超：〈瓜分危言〉第四章，《清議報》第23冊，1899年8月6日，頁4a。

## 徵引書目

《外交報》。

《申報》。

《知新報》。

《時務報》。

《國聞報》。

《清議報》。

《華字日報》。

〈清国外交の活歴史〉，《東京日日新聞》，1905年11月5日，頁6。

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

石川禎浩：〈晚清「睡獅」形象探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頁87-96。

何啟：《新政真詮》，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林啟彥：〈嚴復與何啟——兩位留英學生近代思想模式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頁1-20、31。

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麥肯齊著，李提摩太譯，蔡爾康述：《泰西新史攬要》，上海：廣學會，1898年。

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嚴復：《嚴復集》，北京：新華書局，1984年。

*Abū Nazzarah*, reprint. Beirut: Dār Sādir, 1974.

Alcock, Sir Rutherford and W. Lockhart. "Chin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1887): 443-466.

*Aljazeera News*.

Alt, Peter André. *Der Schlaf der Vernunft: Literatur und Traum in der*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Munich: Beck, 2002.

*Belfast News-Letter*.

Boulger, Demetrius.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08.

Butzer, Günter and Joachim Jacob, eds. *Metzler Lexikon literarischer Symbole*. Stuttgart: Metzler, 2008.

*China Mail*.

Chiu Ling-yeong. "Debate on National Salvation: Ho Kai versus Tseng Chi-ts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 (1971): 33-51.

Choa Gerald H.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Ho Kai: A Prominent Fig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Der Deutsche Michel, erläutert von einem seiner Freunde und Leidensgenossen*. Leipzig: Renger'sche Buchhandlung, 1843.

*Derby Mercury*.

"Die Kinderstube, oder Britannia ruhet in Frieden." *London und Paris* 10 (1802): 331-343.

Dieterle, Bernard and Manfred Engel, eds. *The Dream and the Enlightenment. Le Rêve et les Lumières*.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3.

Dohrn-van Rossum, Gerhard. "Politischer Körper, Organismus, Organisation. Zur Geschichte natürlicher Metaphorik und Begrifflichkeit in der politischen Sprache." PhD diss., Bielefeld University, 1977.

Fischer, Hubertus and Florian Vaßen eds. *Politik Porträt, Physiologie: Facetten der europäischen Karikatur im Vor- und Nachmärz*. Bielefeld: Aisthesis, 2010.

---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

Gandhi, M. K. "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 *Indian Opinion*, December 11 & 18, 1909. Accessed on March 11, 2011. <http://www.mkgandhi.org/swarajya/coverpage.htm>.

Geibel, Emanuel. "Barbarossas Erwachen." In *Geibels Werke*. Ed., Wolfgang Stammler, 1: 183-186.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18.

George, Mary Dorothy. *English Political Caricature to 1792: A Study of Opinion and Propaga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Green, Martin B. *Gandhi: Voice of a New Age Revolution*. New York: Axios, 2009.

Guha, Ramachandra. "A Prophet Announces Himself: Mahatma Gandhi's 'Hind Swaraj' a Hundred Years 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ember 4, 2009.

Heine, Heinrich. "Doktrin." *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 48 (July 20, 1844): 1.

Heine, Heinrich. *Sämtliche Schriften*, volume 5. Ed., Klaus Briegleb. Munich: Hanser, 1974.

Heine, Heinrich. *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 Ed., Ursula Roth and Heidemarie Vahl. Stuttgart: Metzler, 1995.

Hunt, Tamara. *Defining John Bull: Political Caric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Georgian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2003.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Kessel, Jan van. "Allegories of the Continents, 1664-1666." <http://cgfa.acropolisinc.com/k/k-2.htm#kessel> and <http://www.wga.hu/frames-e.html?/html/k/kessel/index.html>

Lim Woo Sing. *The Prominent Chinese in Hongkong*. Wanchai: Five Continents Book, 1937.

*Liverpool Mercury*.

“Letters from the Mountains. Letter VII.” *The Press* 3 (1797).

Maissen, Thomas. “Der Freiheitshut. Ikonographische Annäherungen an das republikanische Freiheitsverständnis in der frühneuzeitlichen Eidgenossenschaft.” In *Kollektive Freiheitsvorstellungen im frühneuzeitlichen Europa (1400 bis 1850)*. Ed., Georg Schmidt, Martin van Gelderen and Christopher Snigula, 133-145. Frankfurt am Main: Lang, 2006.

Münter, Fabian. “Das Waiwu Bu 外務部 ----Reform des chinesischen Außenministeriums 1901-1911.” MA dis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2009.

*National Review*.

*New York Times*.

*North-China Herald*.

Peil, Dietmar. *Untersuchungen zur Staats- und Herrschaftsmetaphorik in literarischen Zeugnissen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Fink, 1983.

Petrarca, Francesco. *Rerum Vulgarum Fragmenta*. Ed., Rosanna Bettarini. Torino: Einaudi, 2005.

Poeschel, Sabine. “Studien zur Ikonographie der Erdteile in der Kunst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PhD diss., University Muenster, 1985.

Quondam, Amadeo. *Petrarca, l'italiano dimenticato*. Milano: Rizzoli, 2004.

*Review of Reviews*.

Rubens, Peter Paul. “The Rape of Europe.” Accessed March 31, 2011. <http://www.peterpaulrubens.org/The-Rape-of-Europa-c.-1630.html>.

Safire, William. *Safire's New Political Dictionary: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New Language of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Sandart, Joachim von. *Neue Archontologia Cosmica*, 1638.

*Sun* (Baltimor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imes*.

Tseng Chi-tse.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3 (January-April, 1887): 1-12.

Wade, Thomas. *Note on the Condition and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1849*.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50.

Wagner, Rudolf G. *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Wagner, Rudolf 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iscourse and Imagination in China at Tiananmen." In *Rethinking Third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James Manor, 121-144. London: Lozan, 1991.

Wagner, Rudolf G.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e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edited by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66-122.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 Center, 2002.

Wolseley, Garnet.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London: Lozan, Green, Lozan and Robert, 1862.

Wolseley, Viscount. "China and Japan." *The Cosmopolitan* (February 1895): 417-423.

Wolseley, Field-Marshal Viscount. *The Story of a Soldier's Life*. Toronto: The Book Supply Company Limited, 1904.